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富人治村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权力结构转型

袁松著

FUREN ZHICUN

本书致力于揭示近年来发达地区农村基层权力运作的实践逻辑。

在城镇化进程中，有实力运作项目资源，推动土地增值开发的农村富人阶层在地方政府基础性权力不足的情况下成为基层工作的支柱力量。

然而，这也意味着巨大利益空间的出现，村民自治中的「贿选」进入难以监管的灰色地带，村庄政治的公共性逐渐萎缩，趋于寡头化的权力结构放大了基层权力「结构洞」效应，输入农村的资源被大量吸食。要走出这种「内卷化」的陷阱，实现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村庄权力必须以其公共性保证城镇化的地利共享与国家反哺农村的战略意图之实现，而不是将乡村的前途寄望于富人群体「带领群众致富」的良心与自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DANGDAI ZHEJIANG XUESHU WENKU

富人治村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权力结构转型

袁松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富人治村：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权力结构转型 / 袁松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12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
ISBN 978 - 7 - 5161 - 6695 - 6

I. ①富… II. ①袁… III. ①农村—群众自治—研究—中国
IV. ①D6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696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田 文
特约编辑 胡新芳
责任校对 朱妍洁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4. 25
插 页 2
字 数 415 千字
定 价 89.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当代浙江学术文库》编委会

主 任 郑新浦 蒋承勇
副主任 何一峰 邵 清 周鹤鸣 谢利根
编 委 (以姓氏笔画排序)
王 河 王俊豪 毛剑波 卢福营
史习民 池仁勇 杨树荫 吴 笛
沈 坚 陈立旭 陈华文 陈寿灿
陈剩勇 林正范 金 涛 金彭年
周 青 周建松 宣 勇 费君清
徐 斌 凌 平 黄大同 黄建钢
潘捷军

编委会办公室

主 任 何一峰
副主任 俞晓光
成 员 黄 荻 周 全 杨希平

总 序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 郑新浦

源远流长的浙江学术，蕴华含英，是今天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文化基因”；三十五年的浙江改革发展，鲜活典型，是浙江人民创业创新的生动实践。无论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还是就波澜壮阔实践的概括提升，都是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的“富矿”，浙江省社科工作者可以而且应该在这里努力开凿挖掘，精心洗矿提炼，创造学术精品。

繁荣发展浙江学术，当代浙江学人使命光荣、责无旁贷。我们既要深入研究、深度开掘浙江学术思想的优良传统，肩负起继承、弘扬、发展的伟大使命；更要面向今天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之要和人文社会科学建设的迫切需要，担当起促进学术繁荣的重大责任，创造具有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的当代浙江学术，打造当代浙江学术品牌，全力服务“两富”现代化浙江建设。

繁荣发展浙江学术，良好工作机制更具长远、殊为重要。我们要着力创新机制，树立品牌意识，构建良好载体，鼓励浙江学人，扶持优秀成果。“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项目”，就是一个坚持多年、富有成效、受学人欢迎的优质品牌和载体。从2006年开始，我们对年度全额资助书稿以“当代浙江学术论丛”（《光明文库》）系列丛书资助出版；2011年，我们将当年获得全额重点资助和全额资助的书稿改为《当代浙江学术文库》系列加以出版。多年来，我们已资助出版共553部著作，对于扶持学术精品，推进学术创新，阐释浙江改革开放轨迹，提炼浙江经验，弘扬浙江精神，创新浙江模式，探索浙江发展路径，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和积极的促进作用。

2013 年入选资助出版的 27 部书稿，内容丰富，选题新颖，学术功底较深，创新视野广阔。有的集中关注现实社会问题，追踪热点，详论对策破解之道；有的深究传统历史文化，精心梳理，力呈推陈出新之意；有的收集整理民俗习尚，寻觅探究，深追民间社会记忆之迹；有的倾注研究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潜心思考，苦求解决和谐发展之法。尤为可喜的是，资助成果的作者大部分是浙江省的中青年学者，我们的资助扶持，不惟解决了他们优秀成果的出版之困，更具有促进社科新才成长的奖掖之功。

我相信，“浙江省社科联省级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金资助项目”的继续实施，特别是《当代浙江学术文库》品牌的持续、系列化出版，必将推出更多的优秀浙江学人，涌现更丰富的精品佳作，从而繁荣发展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充分发挥“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有效助推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现代化浙江的加快发展。

2013 年 12 月

序

《富人治村——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权力结构转型》是袁松在其2012年通过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成书的。

大约是2005年下半年，在浙江衢州广电总台工作的袁松写来长信，讲述了他对“三农”问题的看法、忧虑，表示自己有决心投身三农研究之中。这是一封让人印象深刻的长信，其中也讲到了他的家乡湖北鄂州的农村问题。

2005年正是“三农”大热的时候，袁松出身于农村，又在媒体工作，关心“三农”问题也算是十分正常的了。他要考我的研究生，我当然是很欢迎的。袁松2004年从武汉大学本科毕业，本科所学专业是应用化学，同时攻读新闻专业的双学位，由理转文，到衢州工作两年，终于在2006年考入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跟我读硕士研究生。

2006年是我在华中科技大学正式带硕士生的第二年，之前在华中师范大学工作和带研究生。袁松这一届，我在社会学专业所带硕士生还有赵晓峰、刘燕舞。赵晓峰、刘燕舞也是因为对“三农”问题的兴趣考到我的门下。他们入学后，我却没有让他们去关心“三农”，而是要求他们系统阅读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经典著作。袁松以及晓峰、燕舞和他们这一届其他的研究生一样，没有辜负我的期待，很快就投入到经典著作的阅读中，并且逐渐有了对经典的体悟与把握。我大致统计了一下，袁松他们这一届在硕士研究生期间阅读了100多部经典著作，这为他们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

袁松的特点是心思细密，甚至经常与文字过不去，有些地方会不断重写，不厌其细。也许是受到理工科出身背景的影响，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希望自己的作品没有缺点，这其实很难。

袁松以及晓峰、燕舞都顺利地由硕转博，在博士期间开始了“三农”的调查研究。但这个“三农”调查研究与他们进入硕士前的想象有比较

大的差异，因为我要求他们广泛调研，每年有100天以上时间驻村，且每次驻村都要对村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历史进行细致全面的调查，以形成对农民生活逻辑与村庄治理逻辑的理解。这样，他们对“三农”问题的热情就转化成了学术兴趣。在这样一种学术兴趣的支持下，他们几乎没有一天休息，每天都奋战在田野中、文献里。

2009年国庆是60周年大庆，天安门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这年国庆与中秋正好重叠。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我带着十多个同学在浙江奉化3个相邻村庄调研，其中我和袁松、郭俊霞、王会、陈锋等人在金峨村调研。金峨村以金峨山命名，据说金峨山是宁波第一高峰，海拔700多米，我们登上山去，发现金峨山的确很美。更美的是金峨村，它是当地著名的花木村。丹桂飘香，花好月圆，我们就在这里调研。

正是在金峨村的调查，我们发现了沿海发达地区因为经济发展而必然导致的经济分化，经济分化又导致社会分层，社会分层通过人情等机制形成社会排斥，结果，发达地区农村形成了远不同于一般中西部农业型地区的村庄政治结构，这一结构的核心是积极参与政治的富人与消极对待村庄政治的大多数一般村民。这种不平衡引起了村庄中阶层间的怨气，这种怨气又会以上访等形式来表达。

金峨村的调查使袁松确定了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他希望通过自己在沿海发达地区的深入调查来揭示发达地区乡村治理的特殊性。他因此在2010年底联系到浙江大学毛丹教授，并在2011年上半年用6个月时间在浙中农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调查。2012年上半年，他提交的题为《富人治村——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权力结构转型》的学术论文，不仅顺利通过答辩，还被评为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富人治村——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权力结构转型》很好地把握了时代背景，将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升值与项目进村作为影响村民自治的新的变量，用类型对比的方法把握乡村基层权力结构在资源流量剧增时的突变，在细致观察的基础上描述基层权力运作方式的变化。他的考察范围没有局限于选举、治理等政治现象本身，而是将“富人治村”放在近年来中国农村的巨变之中，挖掘这一村治现象背后隐含着的村庄社会基础、基层治理机制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富人治村》调研深入，文笔细腻，逻辑严谨，有力地推进了华中村治研究群体的既有研究。

袁松现在任教于浙江师范大学，他继续在浙江进行田野调查，且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思考。相信他在博士学位论文出版后，很快就会再有系列关于发达地区乡村治理研究的有力度作品的发表。

期待袁松新的作品。

是为序。

贺雪峰

2014年10月于武汉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一 问题意识	(1)
二 文献梳理	(4)
三 研究设计	(16)
第二章 分化与疏离:吴镇的经济社会形态	(36)
一 田野概况:梯度的非农化	(36)
二 社区记忆:家族的弱关联	(45)
三 社会分层:权力的日常化	(58)
第三章 富人主政:选举产生的村庄权力格局	(81)
一 村委会选举:选票的升值	(81)
二 农村基层党建:新党员的富人化	(108)
三 人大代表选举:“巨富”的游戏	(135)
第四章 地利之争:城镇化进程中的村庄政治	(143)
一 利益构成:嵌入城镇空间的宅基地开发	(143)
二 行动策略:失地农民安置的场域化演绎	(165)
三 博弈结果:富人担纲的必然性	(183)
第五章 场域的定型:乡村治理中的权力互构	(194)
一 村级治理:公共性的萎缩	(194)
二 乡村关系:控制还是交换?	(209)
三 个案考察:参政动机分析	(235)

第六章 结论	(253)
一 内容总结:寡头定理——利益密集型农村的权力结构化	(254)
二 理论透视:权力的利益网络与乡村场域的结构洞	(262)
三 政策反思:乡村治理往何处去?	(277)
参考文献	(294)
附录	(312)
附录 1 吴镇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细则	(312)
附录 2 承诺书样本	(319)
附录 3 越州市委组织部关于“两推一选”制度的工作总结	(322)
附录 4 关于切实解决农村多年不发展党员问题的意见	(332)
附录 5 关于印发《吴镇解决农村多年不发展党员问题工作 责任制》的通知	(334)
附录 6 关于建立 2009 年度解决农村多年未发展党员问题镇 (街道) 领导联系点制度的通知	(336)
附录 7 越州市委组织部关于基层党建工作的调研报告	(337)
附录 8 越州市城乡新社区建设实施办法	(342)
附录 9 关于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实施意见	(349)
附录 10 吴镇岭村社区建设实施细则	(354)
附录 11 吴镇岭村社区建设实施细则补充规定	(360)
附录 12 两封与旧村改造有关的上访信	(361)
附录 13 越州市村级干部基本报酬考核办法	(363)
附录 14 吴镇村(居)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制度	(367)
后记	(374)

第一章 导论

一 问题意识

本书的核心问题意识是“富人治村”的实践机制。这个问题的解答涉及以下三个彼此相关的问题：“富人治村”的治理模式是怎样形成的？它在乡村场域中生成了怎样的权力结构？这种结构在资源密集化的治理背景下会对地方秩序产生怎样的影响？

富人治村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民营经济在沿海发达地区的勃兴，先富人当选村干部已成为当地农村一道常见的政治风景。“苏南模式”消失之后，随着原乡村集体企业的去政治化和去社区化，江苏等地农村出现了大量“先富参政”的现象，并且许多地方还是政府鼓励下的富人治村，如江苏射阳县明确规定：村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个人资产必须在10万元以上（郑燕峰，2003）。而在浙江，据省民政厅2002年统计，先富群体占浙江全省新当选村委会委员的比例约为30%，在义乌、永康、瑞安、乐清等地则是60%（肖菁、岳海智，2003）。

富人治村的现象并不是沿海发达地区的专利，中西部地区城郊附近的农村同样如是。据《商界》杂志社2004年的一项调查，重庆市渝北区玉峰镇6个村的24名村干部中，私有资产在100万元以上的村干部占了一半以上。^①在吉林省白城市，市委制定了《关于大力选拔致富能人型村干部的意见》、《关于大力培养选拔致富能人入党的意见》，重点在选人用人机制上下功夫（鞠万义等，2003）。革命老区甘肃省庆阳市大力开展“双培双带”工程，使越来越多的先富群体走上了村一级的领导岗位，“庆阳

^① 该杂志编辑部在文章中欣喜地判断，“富人治村的新时代已经来临”。引自《富人治村新时代》，《乡镇论坛》2004年第6期。

市卅铺镇 15 个行政村中，有 6 个村的村党支部书记个人资产在 50 万元以上”（谭飞、赵锋，2004）。

2005 年之后，中国农村富人参政的迹象更加明显，乡村新富阶层通过公开竞选的方式走上了政治前台（肖立辉，2008）。从见诸媒体的报道来看，浙江、江苏、广东、福建、重庆、山西、山东、吉林等地的村两委选举过程中，都有大量率先富裕起来的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积极参加竞选，他们以较强的致富能力影响选民的投票意向，还以“承诺”和“捐赠”等形式赢得多数选民的支持而当选。当然，最典型的仍属浙江地区。2009 年，一份最新的调查数据显示，整个浙江省富人当选为村委会主任的比例已达 2/3（商意盈等，2009）。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变化与农业税的全面取消相同步。另一个因素是，近年来农民的生育观念也发生了巨变，村级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大大减轻，已基本上转由乡镇的专属部门来负责。所以，税费改革以后，农村基层组织的主要定位不再是从农村汲取资源，村干部的角色也从繁重的、与村民形成对抗关系的税费征收与计划生育任务中解脱出来，转到引导村庄发展，为村民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方面。于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带头致富能力强、带领致富能力强”的新型“双强”村两委建设成为地方政府努力的目标，而“带头致富、带领致富”的“双带”方针成为全国性的农村基层组织工作的主导方针。各省份陆续启动了农村基层组织创优争先的“先锋工程”建设，旨在“把党员培养成致富能手，把致富能手培养成党员，把党员致富能手培养成村组干部，使广大农村党员在带头致富和带领群众共同致富这两个方面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在革命话语消退和以新农村建设为核心的城镇化浪潮中，农村经济精英的参政热情逐步高涨，“富人治村”也渐渐由颇具新闻价值的“新鲜事”转而成为随处可见的“平常事”，局部地区的个别现象显现出全面扩展的趋势，这个时候，对“富人治村”现象的研究就十分必要：既然这种模式极有可能演变为最为普通的治理模式，那么，对“富人治村”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探讨中国乡村治理的未来和中国基层政治的走向，它关系到基层治理方式的转型、地方秩序基础与社会性质的变化。所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前瞻性是不言而喻的。

笔者对此现象的关注始于 2009 年国庆期间作为华中村治研究团队的一员在浙东地区为期三周的田野调查。一开始只是想考察这一地区的社会

分化,但当地几乎清一色的由富人主持村政的现象让我们感受到与此前经常调查的中西部农村的差别。而且,我们分组调查的3个村的主职村干部的资产实力与其他村干部明显不在同一级别,这些富甲一方的村庄精英高大威猛的形象让普通村民们相形见绌。这种经验调查中的崭新事物对调查者已感麻木的神经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发达地区农村的治理模式与中西部农村的对比如此鲜明,以至于让笔者有了建构理想类型的冲动。

但在接下来回到中西部农村的调查中,笔者却发现,其实中西部农村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富人治村”,只是其中“富人”的内涵有所差别,或者说,是不同地区的村庄社会分层状况有所不同。发达地区农村及城郊农村的特殊之处在于,位于村庄顶层的精英在致富以后依然生活在村庄附近,他们与村庄没有脱离关系。相比之下,普通的农业型村庄中顶层的富人几乎永久地离开了村庄。剩下的仍然在村内生活并担任村干部的精英与普通群众的距离虽有,但还不至于在资本实力上相差一两个数量级,而且和他们处于相同档次的精英大有人在,想要在社会地位上遥遥领先,并不是那么容易。不过,在农村逐渐城镇化、工业化的过程中,上层精英又有回流的迹象,比如在位于武汉郊区的孝感经济开发区周边农村,许多已经在城市买房的“大老板”又重新回到村庄,角逐村内权力,并获得了成功(参见李祖佩,2012)。因此,从类型对比的角度来看,所谓“富人治村”,实际上是村庄权力结构的一个变化过程:随着特定社会空间中的资源愈来愈密集,场域内的权力结构可能会产生相应的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村内各种精英的力量均衡让位于社会分层体系里的上层经济精英的合纵连横,他们彼此竞争与合作的结果将决定村两委的权力配置。

总的来看,传统的家族长权威或“毛式干部”的体制性精英主导村政的格局已经成为过去,“致富能手”引领村庄发展的时代正在走近。那么,富人主导村庄并实施治理的权力结构是怎样形成的?与资源密度的关系是什么?其内在机理为何?“富人治村”模式的普遍化趋势对农村社会的基层治理又意味着什么?要解答上述重大问题,我们不能仅仅停留于现象层面的分析,而是需要深刻理解富人治村发生的社会基础、治理逻辑及其政治社会影响。如此,才能在战略方向与制度设计上做出准确的判断与恰当的调整。

二 文献梳理

本书是一项政策基础研究^①，其旨趣不在于用源自农村的经验材料证实或证伪社会科学的某种一般性理论，也不在于对局部经验进行分析总结，为农村政策的制定或改进提供直接的建议。笔者的目的在于理解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基层治理的权力结构及其变动趋势，理解自上而下施行的“带头致富、带领致富”的基层组织建设方针在农村的实践机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社会科学一般理论的忽视，相反，恰恰是要利用这些理论资源来为有着本土问题意识的理论建构服务。由于本项研究的上述性质，本书需要回顾的既有研究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学界对“富人治村”本身的探讨，而是要超越这一狭窄论域，将视野扩大至农村权力结构及其社会基础的研究。

（一）“富人治村”研究

学界对“富人治村”现象的研究可以按照分析视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可称之为“功能—绩效”视角。这类研究主要从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绩效的角度论述富人治村模式的功能。项辉、周威锋（2001）认为农村经济精英在村庄经济发展与村级事务决策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党国英（2003；2004）认为，富人群体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他们治理村庄可以减轻农民负担，实现农民增收，而且可以带动农村经济与民主政治飞速发展。东部地区农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地区的乡村居民对民主政治有强烈的需求；乡村社会中崛起的富人阶层所具有的社会性质，将会承担起这一历史重担。任强（2005）论述了先富能人参政在市场中介、乡村治理结构、村庄合作文化的转型等方面具有特殊意义，他指出，在社会区分原则已经在乡村社会扎根的情况下，先富群体能否回应农民在新时代背景下兴起的迫切需求，能否在与社区权力结合的基础上形成有效的“市场与公共服务中介”还有待实践的检验。王国勤（2009）认为，“先富参政”的制度安排，在“有效性”，即乡村经济和一般物质性

^① 贺雪峰在反思以中国农村作为实证材料的“中国农村研究”时，将其分为理论研究、政策研究和政策基础研究三种基本类型。详见《论农村政策基础研究》，载《什么农村，什么问题》，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的公共产品供给或提升方面,无疑取得的绩效比较明显;在“稳定”方面,只能说取得了一定的绩效;而在“公正性”方面,则乏善可陈。郭剑鸣(2010)在对浙江省多个村庄的实地调查中发现,富人治村改变了村治的生态环境和职能结构,村庄的公共服务得到强化,“越来越多的基层干部尤其是县乡主要领导在实际工作中,深切悟到富人当选村官,有利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发展村级经济,尤其是乡镇任务的落实。因此,地方领导鼓励并支持富人群体竞选村官在浙江比较普遍”。另一方面,他也列举了一些隐忧:“富人村官对村治责任的担当不稳定,违规违法现象时有发生;富人上台后可能利用职权发展家族企业或转移集体资产,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等。

第二种是“民主—发展”视角,即把农村社会分层与先富能人的参政作为嵌入村民自治的重要变量,探讨富人治村与基层民主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富人治村将会增进基层民主的发展。徐勇(1996)认为,由于能人治理促成了社区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在能人治理下的社区有可能比其他社区更快地实现向法治型治理模式的转换。郎友兴等(2003;2009)认为,先富能人只是“原子”式的政治管理者,并不会形成乡村精英的利益群体,因此这并不意味着富人政治的出现。胡序杭(2005)认为先富能人争当村官,对村级权力结构合法性程度的提高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具有积极效应。卢福营(2006)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从以下几个要点对先富治村与基层民主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证:①获得村民认同的村庄领袖不是普通的农村经济能人,他们之所以能够通过村民民主选举程序产生,除了拥有较强经济能力及社会关系资源,还具有良好的人品。新兴的经济精英治村经过了群众的委托和授权,是对历史上乡绅治村的传承和超越。②从精英主义和多元主义的理论传统来看,精英民主才是现代社会中的常态。村民自治作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将大致经历“管理者控制—权势精英主导—群众自治”的演进阶段。③20世纪80年代创建的村民自治建立在均平化的社会结构之上,当前的实践与之存有偏差,而先富能人主导的多元精英治理是对村民自治制度的适应性调整。基于此,他认为,新兴经济精英治村是农村经济社会变迁的必然,也是国家建构现代农村社会的产物,他们将承担起党和政府赋予的重要使命(卢福营,2008)。

但是,也有少数人认为,富人治村恰恰可能会阻碍基层民主的发展。

黄俊尧（2007；2009）指出，富人治村可能会导致精英治理格局的固化，而这与村民自治的取向相背离：先富能人与村庄其他阶层进行多种类型的社会资源交换和策略互动，改变了选举的进程和结果，乃至影响了村庄的选举方式；他们一方面有可能对村庄的经济、社会事务做出贡献，但另一方面对“民主治村”机制的创新能力和动力均不足，势必会制约村庄内生性民主的发展。^①

第三种是“治理—秩序”视角。这种视角主要通过考察村庄治理实践中精英与普通村民之间的复杂互动来展现富人主政时的秩序构成。卢福营（2006；2012）指出，个私企业主主政的村庄治理是“经济能人治村”，私营企业主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积极参与村庄领袖的竞选，表现为一种基于社会理性和经营理念的政治行为。投资增值成为村庄治理的主要目标，利益导控成为村庄治理的主导原则，务实理性成为村庄治理的重要策略。作为一种精英主导的群众自治形式，村级治理呈现出经营式治理的特征。桂华、刘燕舞（2010）从村庄政治分层的角度来理解富人治村，他们指出，村庄从治理到发展的转型以及村庄的经济分层形塑了村庄政治分层。村庄内外所形成的只有富人才能带领村庄经济发展的话语转换为只有富人才有资格参与村庄政治的话语。这种话语体系的建构固化和维系了村庄政治分层的合法性，从而固化了富人的权威。陈锋、袁松（2010）从村庄日常生活的角度切入，揭示出“富人治村”使得贫富之间的矛盾与公私之间的矛盾纠结交错，对富人村干部们的道德优越感心怀怨气的少数村民选择越出村民自治的框架，通过信访等形式进行非制度的政治参与。赵晓峰（2010）认为，富人在构筑权力结构网络之时也为普通村民参与村庄政治树立了经济实力、道义伦理和社会活动能力三大门槛，在村内形成了政治排斥。而林辉煌（2010）则根据他在浙东农村的调查经验概括了富人主政格局下的新型政治伦理。此外，欧阳静（2011a）基于江西桔镇的长期研究考察了当地“富人治村的逻辑”，她敏锐地感受到，这与传统乡绅的“简约治理”不同，因为富人村干部很少主动地回应村庄内部的公共服务需求。她将富人治村的研究扩展至乡—村关系的视域，认

^① 对此，申端锋、刘金志（2009）在探讨乡村社会地方秩序形成的机制时进一步指出，士绅与国家共享儒家正统，人民公社干部与国家分享相同的意识形态与治理目标，这是非正式的、不规则的地方治理得以实现的关键。